

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互型”的生成逻辑及其困境

王 豪

摘要:媒介化理论长期被视为对当代媒介现实极具阐释力的理论并在中国传播学界备受关注。以库尔德利和赫普的媒介化理论为切入点,聚焦其核心概念“互型”的生成逻辑及其理论局限,可回应国内研究对该理论及概念积极肯定的背后,因批判性反思与系统性考察不足所忽视的理论增益有限的问题。研究发现,互型的理论预设虽通过对相关性框架、行动者群组、交往实践等维度的补充,试图恰切而全面地阐发当今人与媒介紧密依存的社会现实和转型逻辑,但这一分析工具底层概念边界与区辨力的混沌、对多对紧张关系与博弈机制的悬置,及对媒介环境与其间特异性的简化,导致共时性考察的失焦乏力与历时性研究的倒退断裂,进而使该理论原本朝向的复杂性、创新度及批判力被削弱,在实践推动层面后继疲软。当前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媒介化理论依然未解决媒介理论整体性的困境,面对其内部多重矛盾的束缚,该理论还远未成型,对其核心概念的理解及应用亟待在在地化经验研究的交互检验中调适与更新。

关键词:媒介化;互型;媒介理论;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5-006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4&ZD317)

一、从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谈起

不同于效果研究与受众研究两大传统,近年来,一种从实证分析入手研究媒介对其他领域渗透程度的媒介化理论从西欧、北欧兴起,逐渐成为西方传播学家研究的热点。^[1]以夏瓦(Stig Hjarvard)、克罗兹(Friedrich Krotz)、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赫普(Andreas Hepp)等为代表的学者敏锐捕捉到人与媒介共生的现状,指出媒介已渗透至当今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致其不应被视为与文化和社会机制相互分离的存在,^[2]并将研究聚焦于在无处不在的媒介影响下社会如何被组织与重构。

媒介化理论是对过往媒介理论的突破与发展,其不再将媒介作为形塑社会的单向度动力,转而在动态开放、反功能主义的社会系统视角下,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本身与数字机构带来的全部权力关系及基础设施问题密不可分^[3],因而被认为既准确地注意到媒介深深嵌入社会的现实,又走出了过去“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当前媒介化理论内部被划分为两条主要路径:一是以夏瓦为代表的制度化研究传统,即将媒介形式视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化力量”^[4],考察其他非媒介化社会机构如何遵从“媒介逻辑”重新组织,并在制度层面发生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二是以库尔德利和赫普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传统。他们认为媒介化不能被视为一种社会机制向媒介逻辑“臣服”的过程,而应被视为一种媒介扩展社会实践可能性的“非决定”过程^[5],并以“互型”为核心概念考察日常实践如何与媒介在相互依存中共建社会现实。

尽管媒介化理论范式尚未真正成熟,内部分歧不少,但其仍被认为对当代媒介现实极具阐释力,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备受关注。当前,媒介化理论已伴随一批代表性学者的引介与围绕媒介化、中介化、媒介逻辑等概念展开的辨析,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5]、新时期传

播学“认识论革命的中心”^[6],部分学者在对其给予高度赞誉的同时,也呼吁更多的中国传播学者参与进来。

国内现有相关研究中,一部分集中对媒介化理论与概念进行回溯及比较性考察^[7-12],另一部分则尝试展开理论对话,或使用媒介化理论重新审视现有新闻传播研究^[13],或通过其他理论反观和发展媒介化理论^[14]。这些理论推进不可谓不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大多仅将媒介化理论视为统一的对话整体,较少深入这一分歧四散的宏大范式内部,聚焦某一具体理论分支或核心概念,并由之展开深入对话或批判性交锋。此种研究取向,亦导致国内学界虽已熟知该理论范式的基本主张与提出背景,却疏于细致剖析不同理论的理路展开及异同,未能深究各概念设计及理论预期的现实效力,且基于本土经验研究的理论反思仍显不足。

同时,进一步来看,既有研究对制度化路径的理论考察相对集中,而对社会建构路径的探讨主题,则分散于实践转向、传播物质性、媒介伦理、媒介仪式等侧面或宏观主张,^[15-18]欠缺对这一理论路径及核心概念工具等的系统检视与微观考察。在有限的研究中,戴宇辰较早关注到欧陆媒介化研究中社会建构传统的崛起,最先肯定传播型构/互型的价值,他认为此概念能够成为勾连社会理论中结构与能动性两极的一条“中间道路”,可为经验性地展开现实生活的媒介化考察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14]史金铭、王玉婷等亦肯定该概念的启发性并积极征用其于本土研究中。^[19-20]

然而,在国内研究积极引介且逐步征用“互型”概念进行本土研究的背景下,国际学界的相关评价却存在显著分歧:虽有学者支持互型概念可实现微观、中观与宏观等不同层面的跨越和连接,将同时使用的多种媒体渠道打通,^[21-22]是重要的理论贡献^[23-25]。但更有不少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在强调现实建构的过程性时欠缺对社会关系与权力问题的必要探讨^[26],是更令人困惑而未有有助于澄清的^[27-28],且由于缺乏经验证据,只是一种同义反复^[29]，“互型”未能免于被批评为媒介化理论下无差别的“概念潮流”之一^[30]。这些围绕社会建构理路与其核心概念的争议尚缺乏充分的回应与辨析,尤其缺少将其置于当代人与媒介紧密依存的社会现实和转型逻辑中加以检验与再考察。这也导致国内对该概念的征用仍难摆脱缺乏批判性反思的质疑。

基于此,本研究将回到库尔德利和赫普社会建构视角的媒介化理论中,抓住其核心概念“互型”,与其《现实的中介化建构》进行理论对话并展开批判性反思。探究此前仍未得到聚焦但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互型”概念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库、赫二人所聚焦的如今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其超越性在复杂微观的媒介环境与媒介实践中是否得以成立,其考察进路和内涵特征又能否如理论预期般超越既往媒介理论或已有概念。概念是思维的工具,随后研究将进一步关注互型在对共时性与历时性等不同问题的实践分析中,可能存在的解释效力及局限,特别检视其何以回应与解决今天媒介技术所促使的结构不平衡与权力不平等。如结果显示力有不逮,那么这又意味着“互型”这一概念或视角可能遮蔽与忽视的问题有哪些,并最终借此回到起点,反思社会建构路径对整体媒介理论范式发展的有限增益,审视当前该媒介化理论在中国被赋予极强理论价值与预设的不足。

二、新概念工具“互型”的提出及其内涵

鉴于社会生活的基本构件已经潜在地被“媒介”形塑,^[3]库尔德利和赫普从伯格(Berger)与卢克曼(Luckmann)的《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对媒介关照的不足入手,提出“现实的中介化建构”(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概念^[3]。在同名著作的序言中,库、赫评价该书为两人十年来将传播理论与更广泛的社会理论相结合工作的句号,回应自2003年以来他们对社会理论与媒介理论之间对话不足的关注,以更新数字媒介时代所必需的社会理论。

由此,该书开篇即指出,当前“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是通过技术的中介过程呈现给我们的,社会概念亟须从中介化现状与性质出发进行重观。对中介化传播的认识,则离不开对传播媒介如何嵌入社会世界的重新把握,这随之进入到二人的另一重关注点——媒介。社会通过媒介发生变化的过

程,及社会以更复杂的组织模式接合在一起的变化过程,被称为“媒介化”(mediatization)。^[3]媒介化概念的出现是传播研究范式转变的重要部分,^[31]因其无关“媒介效果”,而是用以理解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如何与媒介和传播的具体变化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辩证的双向概念,是交往和社会发展过程的所有转型及其产生的社会和实践形式的简称,所以被视为媒介化理论突破传统媒介研究的典型体现。这类转型如此复杂,它预示“媒介化”已不仅是一种事物、一种做事的逻辑,而是通过不断循环反馈来进一步改变和稳定媒介使社会秩序化的各种方式。^[3]数字时代人类的困境,正源于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转型及对维护人类能动作用、建立满意秩序的努力与执着。

基于此,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转型以走出困境,厘清媒介在使社会再秩序化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利害关系,库尔德利等引入和发展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型构”(figuration)概念,以期将其作为理论工具,最大限度地分析和解释社会世界建立与秩序维系的过程,并从中发现中介化的技术过程对社会世界的潜在影响。

(一)相关性框架:以共同目标取向确定边界

埃利亚斯认为,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在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中形成的,可能性,以及坚持新出现的关联(而不是固定的对象)的重要性”所以主张从社会主体关系和关系形成过程这两个角度看待社会结构,由此提出型构概念,其实质是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网络。^[20]库、赫认同为社会是建立于行动者相互依存关系与互动实践之上的、动态的过程性开放网络,同时注意到对媒介的关注也须考虑其与文化、社会变化间的相互关系,^[32-33]因此他们在“型构”基础上提出将社会实在置于关系视野中,视其为一个不断生成和重构的型构,并以此开展社会和媒介研究。

具体而言,型构是一种可变的、开放式的网络结构的张力集,其强调一种交织过程的模式,是个体们之间或多或少稳定的互动,并在相互影响中生成某种社会意义。以足球比赛或纸牌游戏为例,参与者在过程中不断博弈或合作,共同创造出一套处于变化中的模式,游戏取胜的意义和关键也在其间。当人们以相互依存的方式稳定影响彼此时,他们就形成“型构”。在此基础上,库、赫进一步从三个维度对该概念加以完善:相关性框架、行动者群组和交往实践。这些补充使型构在复杂的依存环境中,既得以延续开放的可能,又保持结构的清晰与相对稳定。由此,他们发展出“互型”^①概念,并使之成为一种模式或工具辅助理论分析。

库尔德利认为,每一型构的边界都由参与其中的个体在相互关联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共同意义界定,这也是他们相互定位的基础。^[3]这种界定边界的方式被概括为“相关性框架”(relevance-frames)。每个互型都有某种相关性框架,即每个互型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取向,无论是一个家庭、一群朋友,还是一个数字平台的用户。他们在共同目标的聚合下,形成一种相互协作又具有张力的动态“环形”结构,被彼此拉扯,也被社会横向牵引,在整合产生的互型内谋求平衡并以此为指南共同实践。在这里,相关性框架的概念界定,亦将互型的社会意义体现为一种独特的共同活动方式。仍以游戏为例,参与者都在遵循规则的基础上期望获胜,在约定或协议中分享某种意义建构和相互观察的实践,处于同一游戏的他们在冲突分歧中也始终共享某一相关性。正是参与者们相互依存的实践才使游戏及胜利产生被共同认可的意义,让游戏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结果”成立,并在持续的互动与张力调节中不断获得合法性与再生产的动力。

这一视角的打开被认为凸显出互型作为复杂性理论的优点,“重视过程的偶然性和多种结果的可能性,以及坚持新出现的关联(而不是固定的对象)的重要性”^[3],区别于制度化传统的媒介化理论与既往一些机械而静态的媒介研究。伴随媒介持续嵌入,新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或较之以往更复杂多元,媒介将会影响既有依存方式或权力关系,甚至成为新的行动者,而相关性框架亦随之改变,人与媒介共生的新互型由此不断涌现。

^①“互型”一词来自《现实的中介化建构》译者刘洪育老师的译法。他在翻译中指出,“型构”如何实现稳定的三个维度是库尔德利及赫普对埃利亚斯原义的发展,因此用“互型”来表示这种转义。本文沿用这一表达上的区分来体现两人对原有“型构”概念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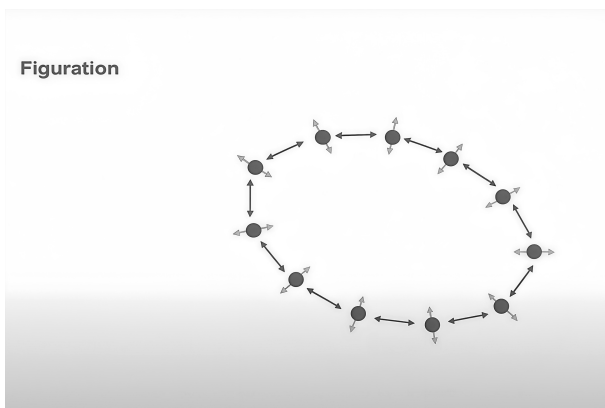


图1 库尔德利和赫普的“互型”示意图

注:图片来自库尔德利与赫普在哈佛大学对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一书的主题推介会,演讲主题:“Deep Mediatization: Social Order in the Age of Datafication”,视频来源:<https://cyber.harvard.edu/events/2017/10/CouldryHepp>。图中以圆点表示构成互型的个体行动者,圆点间的双向箭头代表实践关系,这些实践不断被数字媒体及其基础设施所缠绕与塑造。而圆点指向内外的单向箭头,则分别代表个体在互型内部以及与其他互型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些圆点及箭头共同围绕形成的“环形”代表该互型成员们在实践中的共同取向和相关性框架。^[34]相比《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的文字描述,该图更直观地呈现出“互型”概念的结构及重点

(二)行动者群组:将媒介整体角色纳入结构

除相关性框架外,互型的生成还依托行动者群组(actor-constellations)。行动者群组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互型中的个体以特定方式相互关联而非随机累积;二是个体、对象与技术(包括媒介)均为互型中的行动者。媒介在互型中的位置进而变得更为明晰,因为行动者群组不仅以深受媒介塑造的特定方式相互关联,而且其在指涉人的同时,亦强调技术、媒介等核心参与者。

面对当前更为复杂交织的媒介环境,库、赫明确指出互型间并非彼此孤立,其有两种关联方式,一是通过行动者中具有权力的“转接者”将不同群组径直连接在一起,二是更为复杂的连接方式——“互型之互型”,见图2。在后者情形下,行动者群组不仅包括个体,还特别包括了一类“超个体行动者”,即行动者本身又可由各自的互型构成。这些亦被称为“组合型”的行动者,主要指一些组织机构、社会运动,乃至国家,是媒介作为复数整体性角色参与互型的具体表现。日常语言中,人们不自觉将“谷歌公司”“女权运动”“美国”等称为“做”某事的行动者的惯习,也侧面印证超个体行动者的整体性存在及其重要参与者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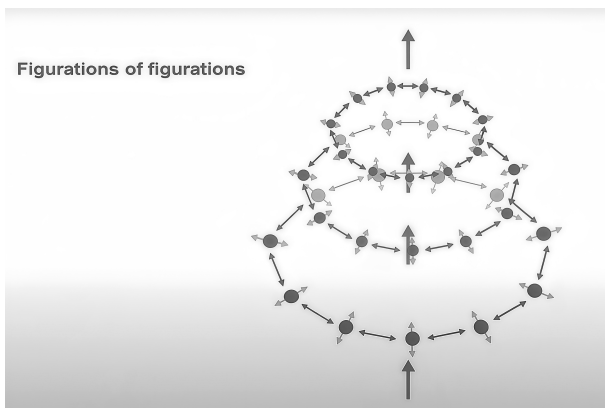


图2 库尔德利和赫普的“互型之互型”示意图

注:图片来自上述库、赫对该书的主题推介会。图中,带箭头的圆点及双箭头和“互型”图例同义,而由一个互型指向另一互型的垂直方向箭头则指通过媒介组合对互型之互型的“装配”与支撑方式

可以说,每一个体不仅参与单一互型,而且时时处于各种互型之互型中。如伴随社交媒体平台崛起,个体的自我维持和社会交往已转变,基于中介化界面的交流扩展了生存视域,使其不得不面对需平衡更广泛竞争欲求的环境。而社交平台作为媒介组合,依赖通信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又作为组织机构,无法独立于经济政治框架,在与其他超个体行动者的共生关系中,社交平台自身亦形成独特互型。后者这一互型深深形塑前者——其他个体行动者群组的传播实践——的底层逻辑与制度形式,“为特定互型的存续和生成提供了空间”,既与其他群组构成互型之互型,又联结成更广阔复杂的依存结构、生产出新的社会景观。对此,两人多次以 Twitter、Facebook 等为例发出感慨,“当脸书崩溃或强加了人们不可接受的隐私条款时,我们置身的多个层面的相互依存关系骤然清晰可见。”^[3,35]

(三) 交往实践:走向特定实践与媒介组合

互型的最后一个特征与实践密切相关,也即型构概念的特殊性正在于其是在持续的“做”中(重新)产生的(are(re) produced in an ongoing “doing”)。^[36]多年来,不少学者亦将库尔德利的理论称为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即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实践行为而非文本或生产结构。^[15]这从库尔德利 2004 年的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se* 一文起,到《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被补充得更清晰。对实践的强调从互型出发,统摄各章。

其指出,互型的解释力建立在对意义关系的理解上,这种意义不仅指向媒介作为符号表征的文本层面,更强调人们在深度媒介化时代通过媒介相互依存与交往的实践及实践反馈。这在前两个特征中亦有体现。交往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s)被视为互型相对稳定的又一要素,即“每个互型都基于某些独特的传播实践及相关的媒介组合。……围绕这些实践而产生的传播影响着互型的总体‘意义’。”^[3]

此外,在以互型为工具考察媒介实践的同时,库尔德利还提出应重视其间媒介权力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他认为关键是理解权力嵌入社会的多种方式,以及其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和配置。媒介规定社会现实的角色建基于权力嵌入日常实践的具体物理过程;这些过程总是有限度的、不完全的……但关键在于,这种过程的产出具有“普遍化”的效应。^[37]进一步说,对互型中权力的分析则至少应涉及三个层面:行动者群组中的身份定位、支持权力关系的相关实践、权力在媒介组合中的体现。^[3]

三、“互型”的局限及理论预期的落空

2013 年至今,赫普和库尔德利多次在研究中运用“互型”概念,而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中,两人对其内涵、特征及生成逻辑做出系统阐释,并将该内容作为第一部分的收尾章节,以最终实现理论对现实与日常生活的分析及指导的贯通。库尔德利曾在该书推介会上说,“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问题如此复杂,即使没有任何现成解决方案,我们也至少需在相应的复杂水平上思考,以理解我们今天所有内置的紧张关系”^[38],这本书的理论和工具则“能给我们一个起点”,帮助观察与思考。

通过相关性框架、行动者群组与实践偏向三个方面的补充,互型已被不少国内研究者认同为媒介化理论的重要分析工具,并征用至在地化经验研究中。但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库、赫的理论预期?当进入两人关注的社会生活与媒介实践中时,“互型”能否作为起点,在所谓中观层面的经验研究中发挥足够阐释力?这是需要深入考察与回应的又一问题。遗憾的是,虽被视为核心概念,但“互型”仍在多方面存在理论断裂与不足,其对传统媒介理论的发展增益有限。无论在共时性问题中,还是在历时性语境下,其都难以恰切置于人与媒介共生的复杂环境中并实现对现实的全面阐发及有力推进。

(一) 共时性语境下并非自明的概念边界

相关性框架建立于“共同的目标取向”之上,这是社会得以透过互型被视为一个个相对稳定、向

内聚合的“环形”结构的原力。库、赫希望借由不同互型勾勒出整个社会图景,涵盖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可能性,全景展现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然而相关性框架的底层理念——共同的目标取向——及其边界与区辨力却被相当程度地忽视。

除“共同的目标取向”外,书中先后使用“共同意义”“共同活动方式”“共同体关系”等试图廓清互型边界,并以此作为参与个体彼此定位的基础。但是,这种“共同”如何被生产、塑造,既非自明、先在,也非静态,或居于更高位置。

首先,在同一互型中,多对“力”的存在确已被指明,它们或来自他者、社会、其他互型,或来自媒介组合及其基础设施,但力与力之间的关系与博弈机制却未有展开和回应。如书中以家庭为例,提出手机和数字媒体让人们知道家人身处何方,可以随时取得联系,家庭成员们会因自身持续的中介化再现产生家庭认同感,^[3]由此试图揭示出媒介力量如何加强彼此依存,进而改变作为互型的家庭。然而,此类论述对媒介组合与其他权力关系间潜在冲突的忽视,使其一旦被置于不同互型框架下重新考察,其理论局限便会浮现:组织互型中,员工因中介化再现可实现在工作中的持续在场,与组织建立更紧密的连接关系,但这对他们产生职业认同感或组织认同感,不仅微不足道,甚至可能背道而驰。库、赫并非未意识到现有框架对复杂权力关系探入的浅尝辄止,他们直言共享相关性“当然不排除冲突或分歧”,但两人继而以家庭为例:“就像在任何其他类型的互型中一样,家庭中可能会有许多冲突,但关键是这些都被理解为家庭冲突。”^[3]如此被一句带过,大大削弱了这一新概念的有效性及阐释力。事实上,同一互型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不断影响和重塑着所谓的共同目标取向,使其在开放动态的张力集中持续演变。这种变化不仅可能推动互型的生成和缩放,同样也可能导致一个互型的彻底崩解与重构。

其次,就不同互型间的关系和超个体行动者的论述来看,不同互型的连接、装配,与共同目标取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也未有提及。对此,一方面库、赫认为:“一些行动者之所以具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是连接不同网络的‘转接者’。当有权势的行动者们在互型之间建立这种连接时,他们之间便建立起等级关系。”^[3]由此说明第一种由行动者径直连接实现的互型关联。这显然与该理论主张考察媒介环境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导向相悖。另一方面,对于第二种更复杂的互型之互型,两人强调媒介组合的关键作用,即超个体行动者经媒介组合搭建联系、形成群组、发挥作用。媒介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塑造了它们的实践和形态,同时这些超个体行动者的共同“意愿”也能以某种媒介的形式具体化,并且因此变得持久。^[3]可以发现,无论是具有权力的“转接者”,还是媒介组合的装配作用,都仅仅是促成新互型或互型之互型的外在条件,难以解释这些互型及其联结得以建立和维持的根本动力与内在原因。不同互型基于各自的相关性框架与意义目标,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张力缺乏深入考察。尤其是不同行动者或不同互型如何通过协商博弈实现相对稳定的连接,达成所谓共同“意愿”的关键环节,在理论及概念阐释中被明显弱化。

由此,相关性框架的补充并不能使型构概念得到完善或实现相对稳定。以前述的游戏为例,如果更多的意义在不同“力”的相互作用下被持续生产,参与游戏的个体不再一心谋求赢的结果,胜利的内涵也经由开放的复杂互动机制转向多元和私人,那么尽管处于同一游戏,共同的意义也未必能被成功塑造,甚至实现延续。进而,互型这一由共同目标取向聚合构成的环状结构设想也难以成立。

虽然该概念被一再肯定展现出了数字媒介嵌入后社会性所加剧的不确定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概念理论性为代价的。相较既有概念“网络”“装置”,互型原被赞誉可以兼收并蓄各自长处^[3],更全面解释“有媒介相伴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3]如何运作并建立,然而,缺失标准的嵌套或缩放一同加剧混乱,与书中试图用共同目标取向廓清边界的内里逻辑相悖,而其结构最终呈现出的敞开性也很难说与数字媒介的嵌入有何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正因错误地将“共同目标”前置为条件,忽视了对力及力的关系的洞察,互型框架使原本开放系统中综合作用的力在进入日常生活的实践分析时,多次被数字媒介单一的强大作用所遮

蔽。分析工具的这一有限性进一步体现在本书第三部分对自我、集体与秩序等层面的变化所展开的考察中。例如,“在深度媒介化时代,自我是通过高度中介化的新的互型来建构的。”^[3]“任何无助于在连接、存档的网络空间中进行自我表现的行为,似乎^①都等同于自我的失败”^[3],崭新的数字自我与具有物质化或肉身性特点的自我的差异及互动关系被划至讨论的边缘。再如“家庭、同辈群体、移民群体或被排斥的人群如今都是集体,它们有意义的归属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使用媒介来建构的”^[3],然而,潜藏于这些媒介化集体背后的数字鸿沟与过滤泡效应等问题如何影响其形成、维系和分化,以及媒介化进程中这些不同的新旧集体如何在形式与特性上进行深层次的转变、迁移等,尽管曾被短暂提及,亦未得到细致辨析和深入阐释。这使库、赫所强调的新互型、新趋势、新秩序,及其内在张力、互动关系与权力问题的复杂性受到削弱。

在此情况下,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深度媒介化之中复杂的互型何以维持相对稳定——再次浮现。即便承认库、赫所述“某些互型对于数字媒介的使用有所增加,但它们仍然可以保持相当的稳定性”^[3],但是当媒介使相互依存的链条变得更长、更加分化、更加不透明,并且更难以控制时,“互型”的理论预设并未有力解释其为何在变化与冲突中始终能够维持。媒介之外,个人或群体的选择和意愿,文化、政治及经济要素的接合及其对媒介与基础设施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散落在互型的阐释框架外,而回归这些才能更充分地回应为何互型“充满冲突”“意义总是具有潜在争议性和可中断性”^[3],但依然成立并具有强大影响。对此,仅通过逻辑推断而远离经验的理论进路,既违背此书实践考察的偏向,也导致其理论预期及现实价值难以落地。书中第二、三部分对深度媒介化时代能动作用问题曾展开多角度分析,其中大量碎片化地引用了现实案例和他人实证研究的发现,不过仍缺乏对具体案例的规范性分析和丰富经验材料的补充。

可以说,关于互型的阐释,基本只描述了互型“如何”的问题。相比“装置”这一“平面情形”,互型的超越性本被认为恰恰是能突显失衡和回应矛盾,但在对意义建构与权力关系的分析方面,互型未能坐实于其自身的理论预期中,这也使全书后半部分对现实的阐释显得较为乏力。这种“力有不逮”进一步在其最终想要落实的实践层面表现为一种对改善现状与调节不平的疲乏,以致最后一章“将我们对数字时代的互型秩序如何符合人类有权对任何生活方式提出的规范性要求的理解整合在一起”^[3],旁征博引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迄今尚不知道如何解决。……我们希望这至少有助于识别这种深层次冲突。令人满意地解决该难题所需要的集体资源,则有待我辈共同去探索。”^[3]而互型框架下的调节方案要么像老生常谈的“倡议”,要么则仍停留在抛出的一个个提问里,失去了对其他概念批判时的精准、犀利。

(二) 历时性浪潮中孤立的媒介环境

有学者认为,制度视角下基于“媒介逻辑”的媒介化理论强调历时性,而社会建构视域下以“互型”为核心的媒介化理论强调共时性。^[39]但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共时性语境中互型解释力的孱弱及理论与实践的推进困难。同时,这一判断也不符合库、赫自身对互型的看法。赫普曾在采访中表示,互型^②概念在历史研究中“非常有帮助”,他认为其可作为一个历史分析工具,实证地描述不同社会领域的媒介变化,比较社会现实在不同语境、不同时期中建构的基本过程。^[40]

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库、赫首次通过对不同时期媒介与传播互型的比较研究,考察社会历史转型的复杂过程。他们拒绝将传播史简化为从一种“有影响力”的媒介迁移到另一种上面的接力赛,^[3]转而从媒介相互关联的媒介环境视角出发提出“媒介化浪潮”一词,并将过去600年视为机械化、电气化和数字化三次媒介化浪潮的历史。媒介的相互关联与媒介和日常实践的相互依存,共同

^①虽然使用“似乎”一词,但作者随后以手机的使用为例,结合“一项针对多国大学生的调查”和“南非一所大学的就业指南”集中论证了在网络中进行自我展现的重要性。

^②不同论文对figuration一词的翻译包括“型态”“形构”等,为对应本文翻译并保持上下文一致,文中将涉库尔德利与赫普理论中的figuration均翻译为“互型”。

促成独特类型的社会复杂性,而“互型”被认为不仅是用以思考这一复杂性现状及发展过程的切入点,可帮助透视媒介化浪潮中的各种关系及变化,也是在复杂性与依存性加强背景下,应理论创新要求而被不断召出的分析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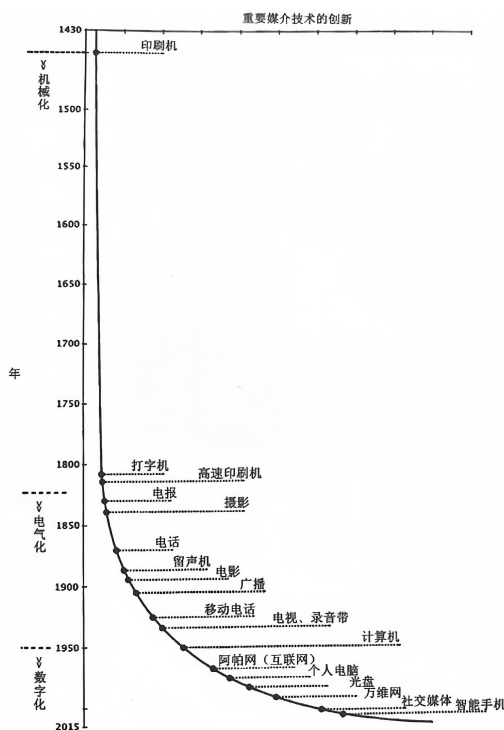


图3 媒介化浪潮及其时间节点示意图

注:图片来自库尔德利及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第三章《媒介化浪潮的历史》第51页

库、赫认为社会转型由整个媒介环境在持续且累积的融汇下发生的转变而推动,而媒介环境则是“在特定时空节点中可用的全部传播媒介”。^[3]通过图3可发现,此概念等于各类技术的综合叠加,或仅包括即将涌现的“新”媒介与持续在场的“旧”媒介的媒介群,而非一个与特定社会文化及制度相依存的、以媒介为面向的实践“域”,其数次“决定性意义的变化”也仅与技术创新相关。这导致媒介化浪潮对传播史的考察并未明显超越既有媒介理论。同时,书中提到,如此进行浪潮划分是因为每种浪潮都捕捉到一种独特的媒介运作方式,^[3]如媒介化浪潮的机械化是指媒介环境转变成由机械来驱动,^[3]而进入电气化是由于一系列快速技术创新带来的“深刻质变”,电气化被理解为使人们跨入一个更深层次的、在技术上更加错综复杂的媒介环境^[3]。然而这一分期依据仍侧重媒介技术内部彼此关联性的变化,与理论基于的核心概念互型及其变化缺乏明确而深入的联系,即既未阐明在媒介组合及其基础设施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实践下,互型的发展、演化与新旧互型间的博弈或互补关系,也未涉及对媒介化概念或深度媒介化社会的中观或微观分析。

进一步看,媒介化浪潮的历史勾勒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在量的层面,具体的媒介组合如何在时间、空间和社会中不断扩展;在质的维度,其如何在更高的组织复杂性层面对社会和文化产生更重要的影响。但是,正如该部分导论“跨文化视野中的媒介化”所强调的,媒介化并不指向“媒介效果”,而是理解社会转型与媒介传播变化如何“交织”的“辩证的双向的概念”。以此反观不同的媒介化浪潮,量与质的维度都未能如期分析这两者变化间的“相互关联”,其主要聚焦前者(即媒介组合量的扩展、连接与融合),并以媒介技术及其变化对社会文化的单向影响为着眼点。虽然理论中,技

术从过去某种单一、孤立起作用的主导性技术,发展成为多元的、相继且叠加的、愈渐紧密关联的媒介群/媒介组合,但事实上,它们依然被视为某种整体性的外在力量,相对孤立地影响着文化与社会,从而并未与制度化视角受到诟病的“技术至上”倾向真正区隔开。

因此,尽管媒介化浪潮的提出已对媒介理论中潜在的简化逻辑进行补充,但仍未能全面、立体且动态地阐释媒介与社会互嵌关系,并在这一互嵌关系中呈现不同时期的互型形式、互型联结与占主导地位的特定类型的互型秩序。这一方面加剧了互型概念生成的深层不足,使得从历史分析转入对当代考察的过程中时,对当前深度媒介化环境下社会世界与“互型秩序”的整体理解存在明显断裂。另一方面,与媒介环境和媒介技术相比,互型理论预设中所倡导的建构主义、物质维度、关系与实践视角处于媒介化浪潮分期逻辑边缘,传播或媒介亦未能如期成为一个与社会深度互嵌的、包括了“一种做事逻辑”和“使社会秩序化的各种方式”的总体性概念。

此外,《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指出“媒介环境在特定背景下的地方、区域和国家中可能采取非常不同的形式”^[3],赫普也曾表示媒介化不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地区间存在很大不同,其是一“特定领域”(a domain specificity)的现象。^[41]但是,在关注到特殊性之外,他们并未着墨讨论其存在的原因及联系,也没有力图回应如何整合特殊性及其后果,仅以这“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普遍的趋势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齐头并进,即使其方式并不相同”^[3]作结,从而使之能被归置于媒介化浪潮的框架,以符合特定时期媒介化特征表现出的整体性和一致化。

追问是何推动媒介环境改变并卷入更广泛个体及社会时,可发现其背后依然离不开文化、政治及经济的抉择,这是特异性出现的重要原因。但这些要素丢失在该历时性考察外,即使书中偶有提及,如“取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中更深层次的差别”^[3]“‘市场’所需的首要信贷通常来自国家和其他机构隐而不彰的背后补贴”^[3],但也仅涉足至此。所谓的“广泛的模式转变”,即媒介化的深化事关所有社会发展过程越来越依赖于遍及全球的传播基础设施,并不能遮蔽同一时期不同语境下媒介化的显著差异。媒介化浪潮中本该现身的、与媒介相互依存的其他社会要件的脉络几乎完全隐身。而在这些要素助推下才得以形成的全球化浪潮中,其所携沙石及在多地冲击后留下的坑洞,一同被低估。

在此语境下,社会建构视角作为一种从“界定性”维度^[42]出发的理论局限进一步凸显:其对全球媒介化进程中异质性及其背后的物质特性仅点到为止,对媒介权力的剖析看似全面实则乏力。相较之下,近年来媒介化理论中技术/物质视角的兴起,则试图突破社会建构范式对结构动力分析的遮蔽,强调对媒介及媒介化认识与定性的“敏感性”维度。这一倾向于对媒介化过程的质的定性,而非对量的关注的鲜明导向,有助于拓展媒介化理论原有的解释边界,补充并加深社会建构理路对媒介权力结构的批判性理解。

此外,也正因媒介化浪潮将传播简化为“我”-媒介技术-社会的结构,与三者互嵌的社会环境被相当地抽离,其间的互动关系与权力机制被无形弱化,相对孤立的三者无一能成为结构的推动者和动力机制的源头。因此,传播结构的形态虽发生着阶段性变迁,但这些变迁不仅在时空和逻辑上存在断裂,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物质层面也有着诸多无法解释的重叠及混沌。这一陈旧、静态的历史描绘,最终不仅区别于技术物质性视角,亦区别于从个人史或从社会学、生产与劳动等其他视角对媒介与社会关系开展的历时性研究。

四、结语

通过与《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对话,以书中核心概念“互型”的生成逻辑和阐释困境为切口分析,不难发现库尔德利和赫普在强调媒介建构社会的主体地位时又要对技术至上倾向进行批判,这种试图协调的失败导致两人的观点既在中层理论中上升不到哲学抽象的层面,相较于伯格、卢克曼现象学视角下对现实的社会建构阐释也仍然遥远。无论是在共时性语境中,由于概念边界模糊、区辨力

不足所造成的理论工具失效,以及由此引发的互动视角与权力结构分析的偏移,还是在历时性研究中,媒介环境与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的脱嵌,以及“媒介化浪潮”所暴露出的断裂与局限,“互型”这一概念始终未能如理论预期那般,有效回应当下复杂多变的媒介实践。在成为一个宏大框架或称隐喻后,互型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媒介化理论着力点始终漂浮在现实的媒介实践表层,并未真正进入制度、关系、行动等层面。在现实中介化的论断中,人与社会事实上都已消失,而媒介在概念的堆叠与拼凑中无所不包又空空如也。这也是长期以来对现有媒介化研究的主要批判观点之一。以“互型”为代表的概念“创新”与富有想象力的媒介化研究层出不穷,但其最终的理论关怀和实践层面的推动力走向何方,仍是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

虽然在国内,传播学界长期面临“传播学危机”的争论与自身理论解释力匮乏的困境中,媒介化理论能够被视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范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媒介化理论依然未能克服媒介理论整体的局限,其理论效力有限。诚然,媒介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封闭理论的“自娱自乐”,但是面对其内部多重矛盾的束缚,需意识到的是该理论还远未成型,核心概念也需重思与完善。“互型”并非一个自足的、可直接征用的分析框架,而更像一个理论端口与理路视角,亟须在在地化经验的交互检验中不断完善其结构设计理论与边界。在将其作为基础性分析工具考察媒介与社会问题时,既要看到其对相互依存的复杂环境的视域打开,也应警惕其内在多重局限可能对理论认知和实践考察造成的遮蔽与阻滞。而面向当今中国社会自身复杂的媒介化现实,仍应对新概念、新理论的“超越性”保持审视,在检验其回应复杂经验现实效力的同时,积极推动本土传播学对这些理论与概念的反思与推进。否则,此类过于宏观的、偏离具体本土情境的视角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理解和行动的误差,理论进路在现实维度也必然遭遇失落。

当前媒介化理论及媒介作为隐喻的泛化,实际上折射出研究在面对数字化社会复杂现实时持续累积的深刻困惑。诸如“互型”这类被视为“通用概念”或“统摄性视角”的理论尝试,一方面回应了理论建构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媒介研究在数字社会中的重大意义,因此具有吸引力。然而,尽管试图突破孤立静态的理路与技术乐观或悲观主义的二元想象,围绕互型所对数字化媒介展开的多元考察仍难以充分契合与应对当下高度复杂、充满断裂与离散性的媒介实践,尤其是面对即将到来的、以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为代表的更具颠覆性潜能的新兴技术冲击时。此外,除了现实层面的挑战,其自身理论演进带来的新课题亦值得关注:媒介及媒介化概念不仅在新媒介技术及其引发的社会现象中得到推进、拓展,同时也牵动着对诸如时间、空间、感知等既有概念与货币、文本、火车等旧有媒介形态及其影响的重新阐释,媒介与社会间的互构关系就此在漫长的历史语境下被重新发掘。基于此,“互型”及其所嵌入的“深度媒介化社会”中“深度互嵌”的变革性意义与内涵,亦处于动态流变之中,仍待国内外学者进一步讨论及论证。因此,在这一现实及理论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回到概念与理论的原点,结合本土实践,重新理解“互型”所承载的“深度媒介化”价值与意义可能,才是避免理论迷失与概念堆叠陷阱的关键,由此也才能真正推动对“深度媒介化社会”实质挑战的深刻理解及批判。

(本文系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教授在2023年开设的博士班课程“传播学经典理论研究”中指导完成,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侯东阳,高佳.媒介化理论及研究路径、适用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5:27-45+126.
- [2] 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媒介化.刘君,李鑫,漆俊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4.
- [3] 尼克·库尔德利,安德烈亚斯·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刘洪育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序-2;3;2;45;5;78;80;90;82;84;86;81-82;88;90;79;73;180;178;212;94;92;16;274;43;49;50;52;57;49;48;47;59-60.

- [4] 胡翼青,杨馨.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缘起:传播学视野中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新闻大学,2017,6:96-103+154.
- [5]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52;147-156.
- [6] 胡翼青,郭静.自律与他律:理解媒介化社会的第三条路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6:128-135.
- [7] 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53-162.
- [8]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47-57+127.
- [9] 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4:137-154.
- [10] 顾洁.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6:13-32+126.
- [11] 胡翼青,王焕超.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4-30.
- [12] 顾烨烨,莫少群.媒介化研究:理论溯源与研究路径.全球传媒学刊,2022,2:143-162.
- [13] 胡翼青,王聪.超越“框架”与“场域”:媒介化社会的新闻生产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38-144.
- [14]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南京社会科学,2021,7:104-112+121.
- [15] 齐爱军.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山东社会科学,2017,1:151-155+192.
- [16] 丁方舟.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新闻界,2019,1:71-78.
- [17] 齐爱军.尼克·库尔德利“媒介正义”观评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3:39-56+126.
- [18] 刘建明,肖珈阳.库尔德里“媒介仪式”研究的理论突破、局限和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31-141.
- [19] 王玉婷,冯诚,朱润萍.传播型构:数字时代新闻社会学的新思路——一个“启发式”的概念和操作框架.当代传播,2025,1:42-48.
- [20] 史金铭,汤景泰.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传播型构:论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自组织行动.当代传播,2023,3:21-28.
- [21] K. Lundby.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 K. Lundby.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4:22.
- [22] E. Nowak-Teter. Mediatization: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 Domains. Sociology Compass, 2019, 13(4): 1-10.
- [23] M. Menke, C. Schwarzenegger. On the Relativity of Old and New Media: A Lifeworld Perspective.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2019, 25(4): 657-672.
- [24] M. Li. Book Review: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7, 94(4): 1263-1290.
- [25] G. Svensson. Book Review: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9, 41(1): 158-160.
- [26] J. Bacevic. Book Review: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ommunications, 2018, 43(2): 286-288.
- [27] M. Ekström, J. Fornäs, A. Jansson, et al. Three Tasks for Mediatization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an Open Agend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6, 38(7): 1090-1108.
- [28] L. Nyre.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2): 835-837.
- [29] W. W. Su. An Epistemological Chang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9, 15(1): 135-147.
- [30] D. Deacon, J. Stanyer. Mediatization: Key Concept or Conceptual Bandwag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4, 36(7): 1032-1044.
- [31] A. Hepp, S. Hjarvard, K. Lundby. Mediatization: Theor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5, 37(2): 314-324.
- [32] A. Hepp.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28(6): 615-629.
- [33] N. Couldry. Mediat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Field Theory // K. Lundby.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4: 227-245.
- [34] A. Hepp. Deep Mediatizat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20: 111-112.

- [35] N. Couldry, A. Hepp. The Continuing Lure of the Mediated Centre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Media Events and Its Enduring Lega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8, 40(1): 114-117.
- [36] A. Hepp, A. Breiter, U. Hasebrink. Rethinking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An Introduction // A. Hepp, A. Breiter, U. Hasebrink.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7.
- [37] 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何道宽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70.
- [38] N. Couldry, A. Hepp. Deep Mediatization: Social Order in the Age of Datafication, 2017-10-18. [2025-08-22] <https://cyber.harvard.edu/events/2017/10/CouldryHepp>.
- [39] 王琛元. 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 概念、路径与启示.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5, 5: 26+126.
- [40] 常江, 何仁亿. 安德烈亚斯·赫普: 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 *新闻界*, 2020, 6: 4-11.
- [41] A. Hepp, U. Hasebrink. Researching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A Figurational Approach // A. Hepp, A. Breiter, U. Hasebrink.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24.
- [42]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界定性与敏感性: 媒介化理论的两种概念化方式.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1: 113-125+128.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Dilemma of the Core Concept “Figuration” in Mediatization Theory

Wang Hao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Mediatization theory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powerfu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contemporary media realities and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critically engages with Andreas Hepp and Nick Couldry's strand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by focusing on its core concept of “Figuration” (*xinggou* in Chinese). In doing so, it responds to the prevalent tendency in domestic scholarship to adopt this theory uncritically, overlooking its limited theoretical utility due to a lack of systematic critique and contextual evalu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figuration, through its emphasis on relational frameworks, actor constellations,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aims to account for the deep entanglement of media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t ultimately suffers from several theoretical shortcomings. These include conceptual ambiguity, inadequate attention to conflictual dynamics and power struggles, and 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media environments and their contextual specificities. As a result, the framework falters in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es, weakening its intended contributions to complexity, innovation, and critiqu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ocial-constructivist variant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remains entangled in broader theore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has yet to develop a robust analytical foundation. Its core concepts, particularly figuration, require further refinement and adaptation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localized empirical contexts.

Key words: mediatization; figuration; media theory; social construction

■ 收稿日期: 2024-05-31

■ 作者单位: 王 豪,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 责任编辑: 刘金波